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参与妇女运动

案例研究





介绍

争取性工作者权利和妇女权利是天生相互关联的。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性工作者都是女性，她们在争取正义、平等以及免受暴力、污名和歧视的权利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挑战。然而，在妇女运动中，接纳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并使其有意义地参与并不容易，阻力既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也有直接虐待。这些通常来自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他们将性工作与贩运和剥削混淆，试图将取消性工作作为“促进性别平等”和“结束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手段。

尽管如此，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坚持不懈，与妇女权利组织合作，以巩固从基层到全球层面的各种女权主义盟友的支持。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最终在妇女运动中取得了显著进展，将长期存在的敌意和误解转变为发展和运动建设的平台。

本案例研究记录了 NSWP 的演变及其网络在妇女运动中的各种参与，研究了最重要的挑战和成就及其影响。此外，本案例研究还展示了妇女运动中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密切合作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观点。最后，本案例研究探讨了从这些参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并讨论了应对当前和涌现出的新挑战的策略。

方法论

本案例研究信息来自针对 NSWP、其成员组织及其盟友的半结构化访谈、内部咨询以及文件回顾。对代表 NSWP 秘书处、成员组织、区域性工作者主导网络以及来自妇女和人权运动的外部利益攸关方的 31 名个人进行了 29 次半结构化访谈。

背景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NSWP 是一个由来自 99 个国家的 306 个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形成的全球网络，其存在是为了支持全球性工作者的声音，并联结倡导性工作者权利的区域网络。它倡导基于权利的卫生和社会服务，免受虐待和歧视的自由，以及性工作者的自决权。

NSWP 所有成员都赞同 [《NSWP 关于性工作、人权的法律共识声明》](#)，并确认他们致力于三个核心价值：

- 认可性工作是工作
- 反对一切形式对性工作（包括性工作者、客户、第三方¹、家人、伴侣和朋友）的刑事定罪和其他法律压迫
- 支持性工作者自我组织和自主决策

2015 年，NSWP 理事会确定将与其他运动建立联盟作为 NSWP 2016-2020 战略规划的一部分，并优先考虑与妇女运动建立联盟。NSWP 理事会将这一战略规划延长至 2021 年

¹“第三方”包括经理、妓院守卫、接待员、服务员、司机、房东，出租房间给性工作者的酒店，以及任何被视为辅助性工作的人。



底，理事会和成员都同意将继续与妇女运动建立联盟作为下一个战略计划的优先事项。

女权主义与性工作

妇女运动包括广泛的个人和组织，各自代表不同的信仰，背景和女权主义形式。因此，对性工作的理解和处理途径存在很大差异，从而陷入了关于语言、权力动态和政策的争论。本案例研究探讨了妇女运动中性工作主导组织的经历如何由两种对立形式的女权主义塑造。

原教旨女权主义和废娼主义

在妇女运动中，最明确反对性工作者权利的声音来自女权主义者，她们认为所有性工作都是一种暴力、剥削和父权压迫的形式。这些被称为“原教旨”、“废娼主义者”、“禁令主义者”或“监禁派”的女权主义者，混淆性工作与剥削和人口贩运，并经常推动“终止需求”或“北欧模式”立法，将购买性服务和第三方参与进行刑事定罪。本案例研究使用“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这个总括性术语，来描述那些无视性工作者的能动性和人权，并坚持认为必须消除所有“卖淫”才能结束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和实现性别平等的人。这些女权主义者基于对性和性别的异性恋规范理解，错误地假设所有性工作者都是顺性别女性，他们的客户都是顺性别男性。

性工作者包容性女权主义

虽然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仍然大力反对，但也存在越来越多的性工作包容性女权主义者和妇女组织，他们支持性工作者的能动性，承认性工作是工作，以及需要采取劳工权利的方法。这些女权主义者通常采取交叉途径切入，承认女性在性别认同或表达，性取向，种族，移民身份，职业，艾滋病感染状况，毒品使用和其他因素方面面临的多种形式的压迫。虽然这些女权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性工作者的权利问题并将性工作视为一种赋权或积极经验方面有差

异，但最关键的是，他们愿意参与对话，并将性工作者的声音纳入更广泛的女权主义议程的一部分。

参与妇女运动的源起

争取性工作者权利的斗争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妇女运动空间。“性工作”这个词本身最初是在 1970 年代后期由性工作者活动家 Carol Leigh 在一次反色情妇女会议上创造的，以强调妇女能动性而不是物化。

NSWP 成员表示最初是通过共同应对性与生殖健康权利（SRHR）以及基于性别的暴力等挑战与妇女运动接触。在 1990 年代初，NSWP 成员在艾滋病毒问题背景下参与了妇女运动。今天，艾滋病毒的话题仍是妇女运动和性工作主导组织之间合作的基础。

然而，尽管有这些共同点，许多性工作者将这些最初的经历描述为排斥和对抗，为有效合作面临的障碍奠定了基础。



合作障碍：性工作者与外部相关方的看法

“我们面临的障碍是不被接受。一切都从那里开始...如果你不理解（性工作者）并接受她们也是女性..... 这是最大的问题。”

Miriam Edwards, 加勒比性工作联盟区域协调员

围绕性工作的污名与刻板印象

性工作者在妇女运动中面临的最根本的挑战之一是根植于刻板印象、道德判断和错误信息的污名。几十年来，性工作者是需要拯救的没有能动性的“受害者”的说法已被不同的女权主义运动所采用，以支持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议程。拒绝这种说法的性工作者经常被贴上“皮条客”或暴力罪犯的标签，进一步疏远了她们与妇女运动的距离。尽管有大量证据反对这些说法，但受害者身份、暴力和剥削的叙事一直难以克服，不仅因为它们的情感吸引力，而且因为它们被含蓄地设计来压制和诋毁性工作者的声音。

“总混淆（性工作）与强奸和奴役。这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论点，很多人从根上就认为我们在提倡强奸，就不会听我们说话。”

Thierry Schaffauser, Coordinator, Syndicat du TRAvail Sexuel (STRASS) 协调员, 法国

近年来，给原教旨女权主义和废娼主义团体的权力和资源越来越多，使他们能够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推广这些叙事。

反人口贩运叙事

性工作与人口贩运和性剥削的广泛混淆，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的白人奴隶制叙事，随着原教旨女权主义者越来越陷入反人口贩运议程和自助，这种混淆更是激增。今天，性工作、贩运和剥削的混淆已成为许多反对性工作的女权主义运动的核心，这些运动以促进性别平等和结束对妇女的暴力为幌子。

在国际法律和人权框架内，围绕贩运人口、剥削和“卖淫”的含糊不清的语言加剧了这种混同。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议定书》中，“巴勒莫议定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6条呼吁各国“禁止利用妇女卖淫营利”，但在妇女运动内，该条被习惯性地曲解为主张禁止一切性工作，特别是通过“终止需求”或“北欧模式”立法将购买性服务和第三方刑事定罪。²

排斥、歧视与虐待

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污名和歧视也加剧了性工作者被广泛排除在妇女运动之外。这种排斥可能是公开的，如性工作者被禁止进入或从运动中移除，也可能是更微妙的形式。例如，2016年，当联合国妇女署发起一项关于性工作的组织政策的咨询时，他们通过进行仅提供英语的在线调研来进行，从而排除了上网的机会有限不会读写英语的全球南方的大多数性工作者。

进入妇女运动的性工作者经常受到来自声称促进妇女权利和赋权的个人的口头，情感甚至身体虐待。

² 术语“第三方”包括经理、妓院老板、接待员、女佣、司机、房东、向性工作者出租房间的酒店，以及被视为促进性工作的任何其他人。



“这确实感觉很暴力... 这些女人中的一些人脸涨红，直接在你的脸上尖叫，‘可耻！你真可耻！’”

Jenn Clamen, Stella, l'amie de Maimie 交流动员协调员，加拿大

因此，许多妇女运动平台仍被视为敌视性工作者的环境。

保持支持和有效纳入

即使在没有直接敌意的情况下，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仍然面临着挑战，无法有效地参与涉及其生活和工作的讨论和决策过程。当性工作者被邀请参与妇女运动时，她们的参与往往仍然是象征性的和肤浅的。因此，即使是参加过众多女性运动平台的性工作者领袖，也可能觉得自己在运动中不被接受。

“我希望融入女权主义运动。即使我在运动中没有被怠慢，我也不觉得自己是运动的一部分。”

Lala Maty-Sow, 主席, Sopeku, 塞内加尔

让已建立关系的盟友始终如一地维护和倡导性工作者的权利，确保性工作者在所有与他们有关的声明、政策和讨论中都可见，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在这方面面临更多挑战。

“主要的挑战是让我们的女权主义盟友真正认识到并谈论性工作是工作，而不仅仅是

口头上说说而已。要将这纳入他们的声明，蓝图和演讲中。”

Nadine Gloss, NSWSP 政策官员

即使是无意的，降低能见度和排斥也会对性工作者本身和联盟的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2020 年，当由 NSWSP 盟友领导的全球女权主义联盟起草一份呼吁制定女权主义 COVID-19 政策的声明时，他们将性工作者和使用毒品的女性排除在因 COVID-19 大流行而被过度边缘化的群体名单之外。在与 NSWSP 沟通后，他们没有修改声明，但同意发布一份额外的纳入声明以列出这些人群。然而，虽然包括了性工作者，但还是没有将使用毒品的妇女作为边缘化群体。

近年来，一些妇女运动行动者也放弃了以前的立场，支持有害的意识形态，证明了对性工作者权利的支持是脆弱的。由于有影响力岗位上的个人不断轮换，这个问题更加严重。2020 年，联合国妇女署（UNWomen）的前执行主任表达了关于性工作者“中立”立场³，该组织的“核心信念”是所有女性性工作者都是受害者，性工作是“最绝望的事情，最不健康的事情，也是发生在任何女人身上最没有尊严的事情”。⁴

外部利益相关方的挑战

对于许多外部利益相关方来说，如何以及是否处理性工作问题的决定很少是直截了当的。在组织层面，即使存在个人盟友，冷漠、陌生和抵制会阻碍性工作者争取权利的工作。

³ “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对 2019 年 10 月 17 日全球信函的答复”，2019 年 10 月 25 日。

⁴ “SWEAT 对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 Phumzile Mlambo-Ngcuka 言论的回应”性工作者教育和倡导工作组，2020 年 7 月 23 日。



“我想到我认识的人可能倾向于在他们的组织内倡导性工作者权利的工作，然后我在想，如果你知道其他人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工作，或者认为这不是一个优先事项，或者认为这太困难或有争议，你如何克服这种阻力？”

Carolyn Eisert, 大赦国际政策顧問

此外，成员，捐助者和盟友强烈反对的风险对某些组织起到了威慑作用。2016年大赦国际具有里程碑意义呼吁性工作完全非刑事化的《尊重、保护和实现性工作者人权国家义务的政策》，仍然是最持久的例子之一，说明支持性工作者的权利如何被当作攻击人权卫士的武器。对于其他人权非政府组织，特别是那些参与妇女权利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来说，这起到了警示作用。

虽然这些担忧并没有完全阻止支持性工作者权利的组织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接触，但它们强调了制定预防措施和应急计划以应对潜在的后果的重要性，例如进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告知捐助者和盟友，并制定媒体计划。

参与形式与主要成果

尽管有这些挑战，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在各种妇女运动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虽然是曲折前进，但它在联盟建设，政策和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和影响。

联盟建设

地方和国家层面的联盟建设

对于许多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来说，地方和国家层面的联盟构成了参与妇女运动的基础，使不同的群体能够围绕共同的挑战和目标进行识别和动员。通过这样做，这些联盟不仅扩大了性工作者的声音，而且扩大了其他边缘化妇女的声音，从基础开始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妇女运动。地方和国家层面的联盟还通过交流知识、经验和专长加强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的能力。

“对于某些问题，是妇女运动要求 PLAPERTS 提供支持，而对于其他问题，是 PLAPERTS 寻求妇女运动的支持。”

Karina Neira Bravo, PLAPERTS 协调员

无论这些参与是否最终形成联合项目、倡导或政策运动，它们在促进团结和奠定进一步建立包括国际层面的联盟基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际联盟建设

一些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在妇女运动中取得的最重大成果是通过在国际层面建立联盟而得到的。这些联盟不仅促进了获得关键倡导和政策平台的机会，而且有助于在妇女运动中获得对性工作者权利的更广泛支持。



性工作者包容性女权主义联盟 (SWIFA)

性工作者包容性女权主义联盟 (SWIFA) 于 2016 年首次构思, 并于 2018 年启动。它一直是 NSWP 在妇女运动中建立联盟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SWIFA 由八名核心成员⁵组成, 致力于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协调对性工作者的权利肯定立场, 支持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与联合国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的接触, 并促进参与妇女运动空间。

自 2018 年以来, SWIFA 伙伴一直支持 NSWP 及其成员参与传统上充满敌意的妇女运动, 如 CSW。此外, SWIFA 伙伴在围绕《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 的工作中, 包括在制定关于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的第 38 号一般性建议 (2020 年) 过程中, 帮助维护性工作者的权利。

SWIFA 的个别成员还担任性工作者权利的大使, 以影响妇女运动中的其他行动者。在更广泛的层面上, SWIFA 的存在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即性工作者的权利是女权主义议程的一部分, 不能再被忽视。

“SWIFA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认为它的存在很重要, 因为它坚持认为性工作者的权利是女权主义议程的一部分。”

Susana Fried, CREA全球项目执行主任

算上我! 联合会

算上我! 联合会 (CMI) 成立于 2016 年, 是由国际妇女基金 Mama Cash 与妇女权利组织和性工作者主导的红雨伞基金共同发起的联合倡议, 旨在支持边缘化妇女, 女孩, 跨

性别者和非二元人群的声音和行动。从那时起, NSWP 与 CMI 成员合作, 包括为行动赋权创造资源 (CREA), 参加并共同主办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 (CSW) 的活动, 以及世代平等论坛和其他全球会议。在 2020 年, NSWP 还为 CMI 的 算上性工作者! 贡献力量, 让人们关注性工作者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遭受的歧视、骚扰和暴力。

参与倡导和政策制定平台

从基层到全球层面,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妇女运动, 在倡导和决策平台中促进性工作者的权利, 从而增加了可见度, 让政策更为切实。

女性权利发展协会 (AWID) 国际论坛

AWID 国际论坛是由女权主义会员组织 AWID 主办的女权主义组织的全球会议, 是促进性工作者权利的重要倡导平台。2012 年, 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 12 届 AWID 国际论坛上, 亚太性工作者网络 (APNSW) 和 NSWP 与 AWID 合作, 为性工作者和女权主义者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空间。作为这次活动的一部分, 当时的 APNSW 主席 KayThi Win 在论坛上发表了大会演讲, 呼吁承认性工作工作是工作, 并要求妇女运动大声疾呼反对侵犯性工作者的权利。在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后, KayThi 当选为 AWID 的理事会成员, APNSW 此后定期与 AWID 接触。

⁵ SWIFA 包括非洲妇女与发展传播网络 (FEMNET), 大赦国际, 为行动中的赋权创造资源 (CREA)、反对贩卖妇女全球联盟、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亚太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组织 (IWRAP-AP)、开放社会基金会 (OSF) 和妇女生殖权利全球网络 (WGNRR)。



“这是全球性工作者首次参与AWID论坛.....结果是，APNSW现在正在不断与妇女权利组织和妇女运动进行沟通并得到纳入。”

KayThi Win, 区域协调员, APNSW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北京+25/世代平等论坛

性工作者在联合国性别平等平台（包括妇女地位委员会、北京+25 和世代平等论坛）中参与的进化，标志着妇女运动中最明显的进步之一。这些平台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压倒性的敌对环境，性工作者面临排斥，辱骂甚至肢体冲突。现在这些平台已经演变成性工作者及其盟友可以有效参与的空间。

自2019年以来，NSWP 与 CMI 和 SWIFA 合作，在 CSW63, CSW 64 和 CSW65 共同主办了会外和平行活动，并促进了 CSW63 和 CSW 64 的性工作者代表团的出席，以及参加 CSW65 的在线会议。2019 年，性工作者代表还参加了在非洲、亚太地区、欧洲和拉美举行的“北京+25”区域会议，以审查《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的执行情况。⁶此外，肯尼亚 KESWA 国家协调员兼 NSWP 副主席 Phahelister Abdalla 被选为世代平等论坛民间组织咨询小组的成员。世代平等论坛是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会议，旨在五年内促进不同议题领域的性别平等。

这些平台的参与不仅提高了性工作者权利议程在全球舞台上的知名度，而且还加强了主流妇女团体的支持，包括那些以前摇摆不定的人。

“去年我们看到，主流妇女团体真的站出来捍卫我们出席的权利，以及我们的声音被听到的权利。我认为这能推进我们的呼吁，因为以前，我们会被关在外面被消声，没有人会说什么。”

Ruth Morgan Thomas, NSWP全球协调员

参与联合国性别平等平台也对性工作领袖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他们与捐助者、国家政策制定者和区域妇女运动平台的联系。

CEDAW

与妇女组织，特别是亚太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IWRAP-AP）的合作，大大加强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参与围绕《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工作的能力。虽然许多 NSWP 成员长期以来一直通过提交影子报告来参与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工作，但 NSWP 提供的技术支持和资源有助于扩大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贡献范围和频率，IWRAP-AP 进行的培训也提高性工作者代表团的信心和知识。NSWP 和 IWRAP-AP 联合发表的《性工作者权利框架和 CEDAW》和《影子报告指南：关于 CEDAW 和性工作者权利》以及 NSWP 的《明智指南：CEDAW》作为参与 CEDAW 工作的额外资源。

在过去五年中，性工作者参与 CEDAW 工作使得 CEDAW 委员会提出的肯定权利的建议稳步增加，表达了对惩罚性法律、污名和歧视以及性工作者诉诸司法的关注，这是性工作者存在和坚持的直接结果。

⁶ NSWP, 2020, “简报说明：北京+25.”



“中亚地区第一次，CEDAW委员会提出与改变政府和社会对性工作者的态度直接相关的建议.....当然，所有这些建议都被传递给了负责在该国实施的国家当局。”

Nataliya Zholnerova, 执行主任, Amelia, 哈萨克斯坦

与此同时，让 CEDAW 委员会持续提出肯定权利的建议仍然存在挑战，这主要是由于该委员会废娼主义成员。例如，尽管性工作者在制定《关于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的第 38 号一般性建议（GR）》的过程中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最终的一般性建议导致了一系列退步的标准，包括因性工作和贩运混淆而产生的“终止需求”措施。尽管如此，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持续与 CEDAW 委员会接触，这清楚地表明，在 CEDAW 委员会的范围内，性工作者的权利不能再被忽视。

国家层面政策制定

许多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也在国家政策和决策的背景下参与妇女运动。虽然无法确定 NSWP 成员在国家层面的全部参与，但他们产生积极变化的潜力是巨大的。

新西兰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将性工作完全非刑罪化的国家，性工作者与各种妇女组织的合作在 2003 年《卖淫改革法》的制定和通过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妇女组织的负责人）与我们合作，坐下来研究我们提交给政治家的（非刑罪化法案）的立法草案。这是一个博采众长的团体。”

Catherine Healy, 国家协调员, 新西兰性工作者集体新西兰

随着全国妇女运动组织对政府机构的影响越来越大，塑造了国家的女权主义，在这些组织和活动中有性工作者的声音从未如此重要。

“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我们参与所有工作，因为妇女运动越来越需要发声.....如果她们在政府部门，那性工作者绝对不应该被抛在后面。”

Kholi Buthelezi, 国家协调员, Sisonke, 南非

女性运动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影响

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接触也对妇女运动组织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向权利肯定立场的转变，并加强了对现有盟友的倡导。

机构影响

对于妇女运动中的许多外部利益相关者来说，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接触一直是组织明显成长的源头。这项工作不仅促生了与作为盟友、伙伴和合作者的性工作者的新联系，而且还从交叉视角加深了对妇女权利的处理途径。

“我们不断了解性工作者的权利是如何构建的，以及性工作者的视角如何能够对经济正义、资本主义、身体自主权进行真正深刻而有意义的批判。我们一直在从性工作者如何能够提出他们的分析以及他们的观点和理论中学习。”

Hakima Abbas, 联合执行主任, AWID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进行教学和培训，起草立场文件，以及制定有关性工作者权利的组织“路线图”，这些都促进了机构学习。除



除了在组织及其成员中扩大对性工作者权利的认识外，这些经历还促进了对盟友关系本身意义的更多反思。

机构影响

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接触对妇女运动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了多米诺骨牌般的影响。盟友们已经指出，为不同的女权主义者创造与性工作者会面和接触的空间为对话创造了新的机会，否则可能没有这些机会。这在改变妇女运动行动者的观点方面特别有用，他们以前对性工作者的权利不知情或不确定。

随着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对性工作者权利的攻击激增，盟友反思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利用自己的地位来促进整个妇女运动的积极变化仍然很重要。

“我们开了一个算上我！会议（是）... 一个意在交叉以建立和创造对话的运动空间。许多参加那次会议的人都告诉我，它是多么重要。例如，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性工作者，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看待性工作和性工作者权利问题的方式，不再是女权主义议程的一部分。”

Susana Fried, 全球项目总监, CREA

除了组织各种会议外，妇女组织还与性工作者合作，建立对各运动产生积极影响的架构和机构。女权主义捐助者 Mama Cash 在 2012 年帮助发起了性工作者主导的红雨伞基金（RUF），并一直担任其行政主办者，其指出 RUF 在更广泛的妇女运动中加强他们在促进性工作者权利方面的作用。

“我确实认为，我们与红雨伞基金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确保我们不断警惕自身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以确保性工作者的权利成为不同议程的前沿和中心。”

Happy Mwendu Kinyili, 项目总监, Mama Cash



成功参与的关键经验与策略

数十年的经验和学习使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及其盟友能够制定和完善在妇女运动中成功参与的策略。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妇女运动盟友总结了以下策略，以促进有效和有影响力的参与。

寻找共同点

从性工作者参与妇女运动的最初起，确定共同挑战和目标的重要性就已经很明白了。虽然艾滋病毒、反暴力倡议和性与生殖健康权利长期以来一直是合作的交点，但性工作者权利和妇女运动的共同点是巨大的。鉴于性工作与贩运和剥削日益混淆，这一战略作为挑战误导性反人口贩运叙事的手段更是前所未有的重要。那些叙事推动有害的政策并将性工作者与妇女运动疏远。

“对我们来说，找到共同点和让（妇女运动）明白我们非常反对剥削特别是对儿童的剥削，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并不是想把所有地方变成红灯区，我们只是想让我们的世界更安全。”

Alex Andrews, 执行主任, SWOP铁栏之后, 美国

对于希望开始参与性工作者权利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来说，确定重叠的优先事项同样有帮助，如可以用来先在其组织内获得支持。尽管许多组织可能没有立即准备好倡导性工作完全非刑罪化，但他们仍然可以支持性工作者权利的其他角度，这些角度与其组织的优先事项，任务和能力相一致。

“对于大赦国际来说，我们必须去解决侵犯人权的问题，这就是切入点。也许对于一个致力于性别暴力的组织来说，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可能是一个有启发的议题.....就讲述为什么这些问题对组织至关重要的故事而言，是有策略的。”

Carolyn Eisert, 政策顾问, 大赦国际

建立联盟与伙伴关系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与妇女权利组织之间建立联盟和伙伴关系，也是促进有效参与和影响变革的重要战略。这种联盟不仅是性工作者能够进入过去充满敌意和排斥的空间，而且能促进对话、协作和能力建设的新平台的建立。此外，联盟有助于扩大边缘化群体中女性的声音，以更有效地倡导变革。

“如果我们建立伙伴关系，那么我们就有了统一的声音来应对影响我们女性的关键问题，在各行各业的同仁都需要使他们的声音达到不同层次的政策和关键决策。”

Dorothy Namutamba, 项目与倡导主任, 东非感染艾滋病毒妇女国际共同体

与此同时，必须注意确保从战略上培育联盟和伙伴关系。经验表明，强大、可持续的联盟并非一蹴而就，必须以共同的原则和价值观为基础。

“与妇女运动建立联盟总是需要时间，但如果能形成一个有认同的核心群体，这是值得的.....要专注于与真正相信我们核心价值观的人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和联盟。”

Ruth Morgan Thomas, NSWG全球协调员



瞄准“可争取的中立派”

通过参与学到的另一个关键教训是，试图改变强硬派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的立场很少是有成效的。相反，事实证明，把重点放在转移“可争取的中立派”的行为者和组织的立场上往往更有效。那些在性工作上没有坚定立场的人，或者那些愿意从基于权利的角度考虑性工作者的生活经历的人，都是可争取的中立派。

“我学到的是不要打扰那些已经下定决心的人，他们永远不会改变。我不会去撞南墙，而是寻找那些仍未下定决心或头脑开放的人，并且只将我的能量用在他们身上。”

Liz Hilton, 代表, Empower, 泰国

由于担心遭到强烈反对或认为缺乏信息，许多组织仍然不愿公开支持性工作者的权利，因此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及其盟友仍然必须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通过这种方式，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及其盟友可以影响“可争取的中立派”，从而在妇女运动中获得大量支持，最终能够压倒最强大的反对派。

软实力同理心

除了针对“可移动的中间派”之外，在应对妇女运动内部的挑战时，采取更温和，更不激进的方法也被证明是有效的。“针尖对麦芒”的策略经常加剧紧张局势，对长期成功和可持续性产生反作用。许多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发现，最好是保持冷静内敛，并尽可能有同理心，不受情感影响提供证据和经验。

“同理心是一种女权主义的价值观，我们只需要一点点同理心来意识到我们都在同一条反对父权制的船上。”

Sabrina Sanchez, 协调员, 欧洲性工作者权利联盟 (ESWA)

采取“软实力”的方法并不意味着性工作者必须避免对抗，而是以有理有节的方式处理紧张局势。

“我的策略是什么... 我一直向废娼主义者伸出手说，‘你了解我吗，你想听听我的论点吗？... 如果你要吐在我的手上，那就在其他人面前做，因为我希望他们看到你不尊重我生活的事实，我正在经历的事情，我看到的事情。”

Cybèle Lespérance, 行政官员, STRASS, 法国

耐心与毅力

由于妇女运动的进展往往是在曲折中前进，因此耐心和毅力也被强调为参与的关键策略。通过坚定地坚守岗位，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可以为女性运动者创造空间，以改变她们的观点。

“需要时间，你必须要有耐心... 目的不是要挑剔人们，而是要让他们慢慢前进，找准一个方向不动摇，并让他们自己向前迈出一小步。”

Neil McCulloch, 高级政策官员, NSW

支持性工作者权利的紧迫性从未如此清晰，而妇女的权利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受到威胁。因此，必须在耐心和紧迫行动之间建立平衡，以确保性工作者的权利不被遗忘。



自我关怀与同情

最后，鉴于妇女运动仍然是性工作者权利活动者及其盟友的争议空间，自我关怀和同情的重要性不容低估。面对妇女运动内部不断的敌意、攻击和虐待，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活动家制定了各种自我关怀策略来应对和恢复。这些策略包括设定界限，建立社群和组织支持系统，以及学习转移针对性工作者的负面情绪。这些策略不仅有助于保护活动家的个人福祉，而且有助于确保整个运动的可持续性。

“如果你不照顾好自己，你将无法继续前进，也无法将你所拥有的知识传递给其他人。”

Eugenia Aravena, 阿根廷性协会主席

对于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接触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来说，想在自己的组织和整个妇女运动中的争议环境中引领他人，练习自我同情同样重要。

“你必须走出去，你必须挑战自己。有人支持你，支持你学习。如果你不知道某件事，不代表你蠢货是坏人。保持开放。提问。但你必须现在就这样做；你不应该再等了。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

Erin Williams, 与生殖正义项目主任，全球妇女基金性

结论

随着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不断巩固支持，参与妇女运动仍将是推进性工作者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参与不仅要被动应对有害的叙事和政策，而是还必须积极主动，为交叉的、包容性工作的女权主义中的对话和伙伴关系创造新的机会。

展望未来，妇女运动中仍然存在许多挑战。通过渗透到反人口贩运运动中，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用于促进反性工作的政策和法律。此外，“性别批判”女权主义同时兴起，支持恐跨性别症和排他的女性定义，进一步威胁到跨性别和性工作者社群。最后，COVID-19 大流行加剧了性工作者主导的组织面临的空间和融资机会缩小的持续挑战。随着大多数全球妇女运动的集会转移到网上，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由于时间资源有限和经济困难，难以保持被看到和听到。因为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获取不平等，以及翻译资源不足，这种转移对全球南方的性工作者产生了特别可怕的后果。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妇女运动中的行动者必须不断思考她们的立场、原则和女权主义价值观。历史一再表明，性工作者的斗争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属于更广泛的争取正义、平等和解放斗争。因此，如果没有性工作者的声音和参与，就不可能达成妇女权利的充分实现。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使用一种方法，确保以性工作者为主导的组织的声音清晰可见。案例研究与 NSWP 成员协商，研究了 NSWP 的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以及区域性工作者主导的网络的策略，活动和影响。案例研究基于持续的监控，利用内部报告和深度访谈。

“性工作者”一词反映了性工作者社群内部巨大的多样性，包括但不限于：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工作者；异性恋男性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性工作；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年轻的成年性工作者(年龄在 18-29 岁之间)；有证件和没有证件的流动性工作者，以及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性工作者；残障性工作者；以及被拘留或监禁的性工作者。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zh-hans

NSWP 是一个私营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SC349355

项目支持：

